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闡析錢穆先生對魏晉南北朝學術之意見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1-2411-H-002-027-

執行期間：91年08月01日至92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暨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張蓓蓓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2 年 10 月 28 日

闡析錢穆先生對魏晉南北朝學術之意見

精簡報告

張蓓蓓

中文摘要

魏晉南北朝介乎漢、唐二大盛世之間，政治經濟雖乏善可陳，學術文化則頗有開創。近世以來學者頗知注意魏晉南北朝研究，較古人大率鄙薄六朝已遠有進步；唯研究方向仍偏重於玄學與文學，未能就學術風氣轉變之關鍵及當代學術之特質與績業，作整體觀察與掌握。

錢賓四先生為當世通儒，史學湛深，思想淹貫，著作等身，所作各書如《國史大綱》、《中國文化史導論》、《中國思想史》、《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等，頗多觸及魏晉南北朝學術之宏綱細目，見識深遠，信可為後起研究者提供無限啟示；唯論述散見各書，未經整理，應用為難。

本人所提計劃為「闡析錢賓四先生對魏晉南北朝學術之意見」，希望透過仔細之收集釐析比對，豁顯錢先生對魏晉南北朝學術經、史、子、集諸方面之詳細意見與評論；然後以客觀立場討論錢說與古今其他學者之意見有何異同，有何突破與開創之處，又可對後起研究者提供何等啟示與貢獻。

預期透過此一研究，可將錢先生在此一領域之成就充分呈現，並可對此一領域之後起研究者提示若干努力之方向。

關鍵詞：錢穆 錢賓四 魏晉南北朝

計畫內容

- 一、本人長年研究魏晉南北朝學術，過去三年內曾針對西晉傅玄之《傅子》、東晉袁宏之《後漢紀》、北齊劉晝之《劉子新論》諸書作全面探究，各撰有專文，總字數超過十萬字。90年出版專書《魏晉學術人物新研》，收五文，包括研究傅、袁之二文及其他三文。正可與余80年出版之專書《中古學術論略》成姊妹篇。又89年另出版專書《認識國學》，乃應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之邀而撰者。
- 二、本人長期接觸並研究錢穆先生之學術著作，獲益極多。81年至88年間，參與《錢賓四先生全集》之編輯工作，所知益廣。錢穆先生逝世十一年來，港、台、大陸計已召開四次國際學術研討會，研討先生之學術成就，可見先生國學大師之地位早獲學術界之公認。唯一般對錢先生學術之討究較集中於漢代學術、清代學術、史學、文化學，尚未有專人專文研究錢先生之魏晉南北朝學者。

- 三、錢穆先生著作多達五十四種，且多具通人之眼光，如《國學概論》、《國史大綱》、《中國文化史導論》、《中國思想史》等，則其對於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之總體定位與評價，頗可探究。又先生針對各領域之專書極全備，從中尤可爬梳其對於魏晉南北朝經、史、子、集各部學術之特殊績業之介紹與評議，有助於後起研究者認識本時代學術之特性與績業。如《經學大要》、《中國史學名著》、《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中國文學論叢》諸書，均能提供極多訊息，有助於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研究者之參詳與思辨。諸書資料分散，未經總匯，為用尚不廣。倘加整理分析說明，則大義可彰。
- 四、研究方法：先對錢先生論述魏晉南北朝學術之文獻作全面收集、整理、分類，繼作證論與分析。如一說欠明，可輾轉以另一說互證相發。如有說無證，可代為引申舉例以明。如二說似忤，可細繹而加以疏通。如此而獲得錢先生對魏晉南北朝學術經、史、子、集諸方面之詳細意見與評論。然後以客觀立場討論錢說與古今新舊諸說之間有何異同、有何突破及創獲之處、對吾人研究魏晉南北朝學術又有何啟示與貢獻。
- 五、預期成果：錢先生對魏晉南北朝學術並不抱傳統之輕忽態度，反甚推崇其兼融華戎南北文化之特色，並又對當代宗教思想瀰漫、佛道二教興起之因果果付予高度注意。其開廣之胸襟與通貫之見地，展現於其全部論述中，深值後起者之尋繹與鑽研。本人希望藉由此一研究計畫作出初步整理，並可供其他學者參考利用。

未來展望

魏晉南北朝學術近世以來頗獲學界重視，與前古不同。近世大學者對魏晉南北朝學術往往有透宗立極之見解，超邁前古，開啟後來。除錢穆先生外，陳寅恪先生、湯用彤先生、劉師培先生、余嘉錫先生等亦均於魏晉南北朝學術有重要闡申及發明。本計畫完成後，仍可連帶對此諸位學者之成就續作檢討及整理，供研究魏晉南北朝學術之後起者參考及利用。

英文摘要

Index And Analysis Of Qian Mu's Views On Wei-Jin Scholarship

Abstract

Wei-Jin Dynasties were wedged between the glorious Han and Tang Dynasties without any comparable political-economic greatness. Our contemporary scholars have begun to note the significant scholastic development that took place during the period, however, most studies and publication have been lavished on Mystical and literary aspects of such scholarship, rather than the loftier topics of: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the period's overall scholastic achievement; or, the aspects of the milieu that fostered just such a scholastic culture. Qian Mu was a revered Historian and Philosopher, and a prolific author. The tomes of his writings across various fields contain many references to and comments on Wei-Jin scholarship. My proposal is to classify and analyze his views according to the four divisions (Jin, Shi, Zi, Ji) of scholastic documentation. I shall also incorporate other remark-worthy points of view by other scholars for comparison. This work should serve to put in full display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Qian's own scholarship on these subjects, and hopefully provide some guidance to the aspiring students to come.

Key Words: Qian Mu Qian Bin-si Wei-Jin Dynasties

精簡報告內容

本計畫原先設定為整理並闡申錢先生對魏晉南北朝學術 包括經、史、子、集 諸方面之詳細意見與評論，進而依錢先生之意綜論魏晉南北朝整體學術文化之特質與績業。惟進行以來，頗覺須先闡明錢先生對魏晉南北朝史之看法，始易理解錢先生何以對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作如此之詮衡與評價。故實際進行時，改從闡申錢先生對魏晉南北朝史之綜合看法入手，漸次述及學術。

關於魏晉南北朝史，錢先生之看法主要表見於《國史大綱》（《全集》27）、《中國文化史導論》（《全集》29）、《國史新論》（《全集》30）、《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全集》31）、《中國史學名著》（《全集》33）、《政學私言》（《全集》40）諸書中。茲綜述其看法如下。

一、政治須有理想與正義。 魏晉南朝政府得位多不正，亦未嘗顧及所謂政治之理想與正義，顧自以文化正統自許，而整體治道多因循，或落空。十六國及北朝雖為胡人政權，早期淫酗殘忍，不可勝道，但漢化漸久，漸知嚮慕勝國儒業，重用北方大儒，欲以《用禮》興太平。留存北方之士族亦能因勢利導，導胡主於正道。故至北魏孝文帝下迄北周武帝、宣帝時，北方急速漢化，所定均田制、三長制、府兵制等，均能顧及民生經濟，表現人道意味，合乎政治之理想與正義。故南、北勢力逐漸倒轉，終致於北方壓倒南方，重獲一統。

二、北進南退。 曹操蕩平北方群雄，獨不能降服長江流域之吳、蜀，足見南方新力量之興起。迨北方動亂，晉室南遷，亦賴長江流域為新家園。但南方處境安逸，皇室與名族多圖苟安，相率為文學清談，或溺於宗教，缺乏理想，亦缺乏政治實績。北方士族則在困境中圖存，相率為經術、政務，保存傳統學術文化，並且轉胡為漢，政教漸上軌道。李沖、李安世、楊愔、蘇綽、盧辯建立諸制，良法美意，沿用以成隋唐之盛。

三、胡漢融合。 三國以下，胡人漸次內徙。胡漢夾雜，終於引生五胡十六國之亂。但此種紛爭，並無太多民族鬥爭之意味，反較近於社會內部之紛擾。

雙方逐次融合，漢人之逃居遼東與西涼者，漸次回歸，而俱有功於鮮卑之漢化。北方士族確已盡到教育同化胡人之極大努力。如暫撇開擁戴胡人君主之一端於不論，亦可謂其保存發揚傳統文化精神之貢獻尚在南方名族之上。胡漢歷三四百年融匯，大抵在和平中全部化為中國人，民族獲一大融合，隋唐文化亦見重光，直追兩漢。

四、門第在本時代中之地位。門第形成之因，主要由於東漢以還，累世經學與累世公卿，積久自成門第。漢末亂離以來，鄉舉里選不得行，權設九品中正。中正制亦為適應當時之實況而生，非無可取。然久後九品中正制遂成門第之護符。門第在魏晉南朝之地位，殆幾乎可稱為變相之貴族，享有政治、經濟方面之特殊權益。然而門第不失為有文化、有教養。學術文化，禮教大端，亦賴門第保存。門第精神，成為南方立國支柱。不用名門秀士，人才意氣率更不成。但門第並無真實力量，又兼日久消磨，終於在朝市革易中漸次失其尊嚴。北方門第不如南方清貴，在困境中圖存，重經史幹濟、務博綜，不似江南專以清虛為尚。北魏原亦尊寵鮮卑貴族，但漢人因勢利導，如蘇綽便教宇文泰打破門第、拔才任賢。如此則漢人自見騰驤、鮮卑自見湮沈，漢人終於把握北方政教之權。門第學脈，成為北方政教指導。如王通者，便是北方門第學統之顯著標徵。其學說之醇正，即朱子亦盛贊之，可參《朱子語類》卷 137。無論如何，南北兩方之門第，俱已盡到保存學術文化之責任，惟北方上探政術，南方下流於文學、藝術、清談、宗教，是其異。

五、宗教在本時代中之地位。政教衰，代之而起者必為宗教。魏晉南北朝時期佛、道俱盛，然學術尚有傳統，人物尚有軌儀，宗教仍不得謂籠罩一世。宗教之興，與亂世禮樂不興有關。宗教中自有一番禮樂精神。宗教亦與教育為代興。士人失職，教育不張，宗教遂取代教育民眾之權，而成為民眾向道之心之所歸。又變相貴族掌握政權，漢代頗有成效之地方自治幾乎崩潰，宗教遂亦成為地方民眾處事寄心之依賴。門第境遇雖優，內心空虛，保全家門之念又強，亦往往乞靈於宗教。佛教雖由外來，與儒、道互有同異而非不可相和合。當時南北雙方，對待宗教之態度亦不同。北方佛法常受王室擁護，頗欲造成一種神權政治而未能成功。南方佛法則多由士大夫自由研習，多為純哲學之探究，頗欲將佛教哲學代替儒家思想，成為人生真理之新南針。北魏時期曾見道、佛相爭，就某一意義言，實非宗教衝突或思想衝突，而為胡漢政治衝突之變相。無論從傳統政治理論或社會秩序而言，佛教興盛有損無益。最後北方教爭漸歇，傳統政治理論重新得勢。南方則由幾許高僧大德熱心體證，精研佛理，提出「眾生皆有佛性」、「頓悟成佛」等理論，佛法終究逐漸中國化。道教則缺乏嚴肅厭世之心理，常偏近於方術，追求神仙長生，反不如佛教具有拯濟眾生之精神，其影響亦不如佛教為大。

化，錢先生之看法主要表見於《國學概論》（《全集》1）、《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全集》19）、《莊老通辨》（《全集》7）、《中國思想史》（《全集》24）、《中國學術通義》（《全集》25）、《講堂遺錄》中之《經學大要》（《全集》52）、《中國史學名著》（《全集》33）、《中國文學論叢》（《全集》45）、《雙溪獨語》（《全集》47）、《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全集》43）諸書中。為清眉目，茲分項敘述其意見與評論如下。

一、經術儒學衰而未竭。

無論南北雙方，社會上對於傳統家族組織及儒風禮教，一樣努力保持，並無多少變動。一般士人生活及思想，雖受道、佛浸染，但多係儒道兼修或儒佛兼修。就儒學而言，魏晉南北朝可稱為儒學之「擴大期」。北方之《周官》，南方之《儀禮 喪服》，對當時社會政治貢獻甚大，與兩漢經生之通經致用並無二致。就經學而言，魏晉南北朝甚至可稱為經學之「成立期」，因《十三經注疏》中許多部撰成於此一時期。北方亟欲以經術爭政治，故何休《公羊》大行於河北，熊安生、蘇綽號為《周官》大師。南方尤重禮，唯禮可以有助於維繫當時大門第。名僧慧遠、雷次宗等均以禮學名。杜佑《通典》中有《禮典》一百卷，載魏晉南朝人論述極多。南方亦重《易》，唯《易》可與玄相通而為人生之指引與寄託。故經學在當時仍然有活的使用，並非「死經學」。王通乃北方儒統最後之結晶，其「續經」之主張雖若驚人，究其用心，實與孔門用世一脈通同。當時南方文學尤盛，然劉勰《文心雕龍》則主「宗經」。文學寫性情，性情中不外道義，而道義則薈萃於經典。三國魏晉動亂時期，儒生知識分子或逃於遼東，或逃於五涼，最後仍匯歸中原，卒以「遼東儒學」與「河西儒學」助成北方漢化之大業。經術儒學，在此時代，至多可謂衰而未竭。豈如一般想像，四百年來只講莊老玄佛，而仍能接續中國文化遺緒以開隋唐之盛？

二、史部之成立與史學名著之產生

魏晉南北朝史學鼎盛。四部中之史部確立於此時期。據《隋志》，當時史學不惟自經學中獨立，並且發展為十三類之盛。實為中國史學之極大演進。當代學術，一方面是莊老玄佛，一方面是經史儒學。史學與經學相通，而發展甚速，猶過經學。此中必有某種意義。如許史著，在當時亦必有其實際的作用與影響。時代影響學術，學術亦影響時代，皆非偶然。抑或可謂，史學興起一方面代表經學之弱化，一方面亦代表經學之轉化。而當代注重人物、注重文筆，亦必於史學之興盛有一定助力。「雜傳」、「譜系」、「地理」類著作之多，尤可注目。史書當能表現史情、史意。愈能表現歷史之意向者、歷史之情態者，愈見為良史。就今而言，此時期之史書，最有價值者尚非各代正史、雜史，而為《世說新語》、《高僧傳》、《水經注》。《世說新語》恰能完整展現此一時代之歷史精神、時代特性、玄學清談及人物風流。《高僧傳》則完整展現四

百五十年來佛教傳來引起之思想、社會變動，以及佛教在中國本身之演化。《水經注》則全面透露中國大地數百年間歷史、人文、社會、經濟等各種大變化之跡象。三書皆可稱為魏晉南北朝之史學名著。

三、新哲學與王弼、郭象之評價。

魏晉南北朝時，《易》、《老》、《莊》均有許多新注，道家哲學面目一新，並獲得一世之嚮往。《易》學方面之更新，主要在掃除漢代「象數易」之繁蕪而代以哲理，此當歸功於王弼。弼曰：「象者，出意者也。」「變者，情偽之所為也。」以情意二字替出象數，遂將漢儒之《易》學研究法改換，並將當時關於宇宙、人生界之思想方法與理論根據徹底翻轉。《老》學方面，王弼、何晏等提出一種無天帝、無主宰之自然宇宙論。弼實多采《易》義與儒理來注《老》，故《老子》中權謀術數之意弼皆不取。但流風所被，魏晉人不免多推挹老莊在孔子上。《莊》學方面，郭象徹底發揮無神自然之新宇宙觀，人生亦主純任自然，無心順有；與王弼異，亦非莊子真相。如是則有自然，無人生。有放任，無工夫。是頹廢，非達觀。曲說媚世，成為「虛無主義」，可稱「偽莊子」，而貽害一世人。若論王、郭之不同，王弼、何晏尚期由老子上通儒術，郭象、向秀則以儒術下就偽老莊。又，王弼在中國思想界另有一重貢獻，則在首先提出「理、事對立」之概念以及「體、用一源」之概念，所以又言「統之有宗，會之有元」。郭象亦另有一重貢獻，則在強調「理」字以解說天地自然一切變化，並將「自然」主義發揮至無遺蘊之地步，所造至有老莊所不能望者。綜而言之，魏晉之新哲學，仍隨時代轉，不能轉時代，尚不能達到開創時代、引領時代之任務。

四、清談之風。

隨玄風俱起者為清談放達。清談何以起？程子以為乃東京節義之反動，朱子則以為亦承東京節義之意氣而起。故曰：「蓋當時節義底人，便自有傲睨一世、污濁朝廷之意。這意思便自有高視天下之心。少間便流入清談去。少間那節義清苦底意思無人學得，只學得那虛驕之氣，其弊必至於此。」清談放達，亦當時門第所以自放於傳統政事、禮法、學術之外之一特殊姿態。其實與門第家風家教之間存有不可彌縫之裂痕。此一姿態，或可謂為崇尚老莊之變質。然如竹林名士，放言高論，聳動一世，亦終扭不轉社會全局，只在思想上增紛擾，踐行上增苦痛。於世何濟？幸而清談末後流於談戲，南方世家子弟僅以此玩玄理、逞口才、顯風流，如王僧虔誡子書所謂：「論注百氏，荊州八帙，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尚不能動搖傳統文化深厚之基礎。唯文化種子亦因是而漸見腐蝕，故南方終不競。清談家如盆景，有生命，有意態，有標致，然壅培薄，根器小，無骨無氣，終不濟事。然純就人品而言，清談家縱是未聞大道，至少約當狂狷，當為孔子所欲裁，而非所斥。世風日變，

恆可懷也。

五、個性伸展

儒家講求大群主義，雖曰性善成德，為賢為聖，畢竟個性自由似較無由伸展。道家則言逍遙適己，不恤家國天下，個人地位若較重要。漢末以還，世事既無可為，道家思想興起。魏晉數百年人心趨向，可以一言蔽之，即個人自我之覺醒。無為退守，所以善葆我真。當代哲學，鼓吹自然，主張任情率性，尤更強化個人主義之興起。當代文學，亦漸脫去政治性，僅以個人自我為中心，以日常生活為題材，抒寫性靈，歌唱情感。德業事功，皆所不爭。甚至一切書畫美術雜藝亦均在此大趨下隨個性之伸展而得伸展，得發揚。唯因於當時之社會情態，文學藝術蓋仍未完全脫去貴族性與宗教性，尚未能普遍化。此則不得不俟之於有唐。漢末魏初，曹操為求治世之才，高唱「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才與德孰重，以及才與德之關係，激起一世之鄭重討論。劉邵作《人物志》，專以才之角度觀人。才亦來自天生，然人各不同。何以如此？不得不又牽及陰陽五行家言。人各有其個性才情，一旦有所展布，必具個人之奇姿異采。由此人物風格之論大興，成為名士風流之重要內容。當時論人物，已由儒家道德觀轉為道家藝術觀，而極重雅、俗之分。當時人之人生理想，已由外在治平實蹟轉為個人自我價值之實現。清談玄思，詩文華藻，甚至風流標致，皆為士人個性才情所傾注，而為自我完成之一念之所寄託。

六、文藝。

魏晉以還，文藝隨個性之伸舒而興起，已如上述。大體而言，文學應表現個人之情感，但仍應與整體人文社會之共同理想相呼應。詩文雖屬一技，貴能由技而進乎道。六朝之所以有純文學之產生，擺脫政治性而獨立，正緣當時人之重性情。然當時人過分退嬰自喜，當代文學亦畢竟重性情而輕道義。此所以有唐韓愈終出而提倡「文以載道」。宋蘇軾稱韓文「起八代之衰」。惟見個人小我之喜愕悲歡，非不款款動人，終難與斯文大傳統接軌。此所以李白深嘆「大雅久不作」也。故本時代之文學雖有可觀，終是未達極致。其中唯有劉勰《文心雕龍》，力主原道、徵聖、宗經，能見文學之本原，能知文學之最高境界，雖韓愈以次所舉，亦無能逾此。然當代文學，難免尚多帶貴族性；當代藝術，亦多帶宗教性。須至唐代，隨政治社會文化大流之移轉，而平民文藝始暢遂發皇。但建安鄴下文風終是大可欣賞。書寫內心，始有文人之文。當時之小品文甚佳，詩、賦、散文亦有合流之概。至於藝術方面，書法北碑南帖，繪畫亦南北有別。南方漸近日常人生風味，終居主流而占上風。藝術亦重品。書品、畫品，均與人品密合而有雅、俗之分。梅蘭竹菊稱為四君子，若作者非君子，則梅蘭竹菊亦不見高雅之氣，不成君子之格。文藝豈小道哉！

七、教育。

魏晉南北朝時，政亂於上，家興於下，宗教亦發達。國學鄉學多是具文，教育之權，一在門第，二在寺院。門第之所以有生命力，正在門第有教育。保家則有儒風禮教，處世則用老莊之教，其他文學藝術，皆所以寄情遣興，兼見風流教養。然世族並無教育社會群眾之熱心。於是佛寺僧侶乘時而興。所謂寺院教育，觀於道安、慧遠之徒眾廣大，行化四方，便可想見。《高僧傳》中，幾許大德名僧，皆由寺院養成。名僧多兼通內、外之學，得一世之歸仰。習鑿齒稱道安「內外群書，略皆遍睹」。慧遠在廬山講喪服。劉勰亦出身寺院，依沙門僧祐，法號慧地。直至隋唐，早期之人才仍多出自門第與寺院。唐韓愈作師說，謂當時繼承南北朝，唯僧人得稱「師」。此下當為儒門興師道。直至北宋，理學起，書院興，教育之權始完全由和尚手中重歸儒門。宋人云：「儒門淡泊，豪傑多為方外收去。」極可見六朝隋唐人才與教育之實況。迨民間教育大興，知識解放，宗教勢力始相應消退。惜當時門第教育與寺院教育之方法、制度，均無可細考。雖不可考，固不得謂其無一套方法和制度而得有光昌之成績也。

八、宗教。

魏晉南北朝時，天下動盪不安。個人主義者冀以超世之宗教逃避現實，寄託精神。集團主義者則冀由宗教刺激新生，恢復力量。於是南北雙方不約而同走向新宗教。佛教接步老莊道家之玄思而興起，道教則由道家思想墮退為方術，後又經葛洪、陸修靜、陶弘景之增補而漸漸形成具有嚴格意義之宗教。儒、道、佛三家思想，實頗有可以相通處。佛教之平等觀與慈悲觀最近中國傳統觀念，惟佛家對人生抱悲觀看法，不主改變人生，因此嚴肅厭世。其不滿現實人生，頗與道家為近。但道家消極而不厭世，只想利用方術操弄自然，缺乏奮鬥爭取之精神，只能曲折走上追求神仙養生長生之路。佛教在中國發展過程，約可分三時期。一是小乘時期，講輪迴果報等，可與民間所傳巫術、陰陽之術相配合。二為大乘時期，先空宗，後有宗，講宇宙哲學，可與老莊玄理扶會。三則進入天台、華嚴、禪宗階段，專重人生界，精修內證，實踐勝於思辨。此已至隋唐。至此佛教遂完全中國化，而殊異於印度原有之精神。此中變化，不得不推功於竺道生。道生講佛性，講頓悟，乃逐漸透出佛法中國化之印跡來。中古時期之思想史，直言之，可稱為佛學、理學之爭衡期。此一階段，至宋代理學之興起始畢功。又當時高僧，研求佛法，如飢如渴；西行求法，勇猛精進；其探求真理與開闢新天地之精神，深值吾人之敬仰。

九、門第與當時學術文化之關係。

南北兩方，政治經濟社會俱多疵病，惟賴士族門第為精神堡壘。士族門第亦確實盡到保全文化傳統之責任。孝弟禮法，敬宗恤族，經史文哲，代代相傳。門第中人，實可謂為亂世中之文化種子。盛門名族，特以學業承緒，不以帝王

以貨殖貲產，而得以維持數百年不墜。魏晉南北朝學術，以禮學最盛。北方講《周官》，南方講喪服，或為興政法，或為保家門，無不成為一代之顯學。北方名族，研古經史，建立三長、均田、府兵之制，不僅為北方胡人政權建立良法，亦影響及於唐代之制度。南方名門，學風尤盛，王氏七葉，人人有集；文史學業，遞長增榮，而歷史民族生命之護養尤賴門第之支持。大體而言，南方門第在優越感中帶有退嬰保守性，北方門第則在艱危感中帶有掙扎進取性，然其在大動亂中守先待後成為民族希望之所寄則一。門第中人，談吐學養，非他人所能及。因其常在高位，故又深明政治事權、禮樂儀軌。「王氏青箱學」即是明證。故門第中人多具政治才具。唐初人才，仍多自門第中出，有以蔚成唐代之大盛。《通典》、《貞觀政要》，皆可見唐代政治人物與政治思想之優秀。